



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项目成果
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郑克鲁主编



奈保尔： 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

○ 杨中举·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项目成果
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郑克鲁主编

奈保尔：跨界生存 与多重叙事

杨中举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奈保尔：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杨中举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9. 1

(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郑克鲁主编)

ISBN 978 - 7 - 80186 - 927 - 2

I. 奈… II. 杨… III. 奈保尔, V. S. (1932~)—文字研究 IV. 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4526 号

奈保尔：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349 千字

印 张：22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186 - 927 - 2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总序

郑克鲁

改革开放以来,20 世纪外国文学的介绍获得迅速扩展,但主要是作品的翻译和评介,对 20 世纪外国作家的评析则相对较弱,尤其关于 20 世纪外国作家的专著更是少见。目前以专著形式出版的主要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发表的研究成果,而且这些专著并非全面研究某一个作家,往往是研究作家的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创作。本丛书的出版正是力图弥补这一缺憾。

全面研究一个作家的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困难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综观作家的一生,作品浩繁,且不说需要全部阅读,就是要看完大部分作品也并非易事。而全面研究一个作家,这一点却是必须做到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外国文学专家很少有专著出版,博士生的学位论文也只以作家的某一时期和某一方面创作进行研究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避重就轻。还有一点,眼下评估一个教师的研究成果,都是以论文的多少来计算的。据说论文才算质量高,专著是硬凑的。也许有些专著情况是这样,有些教师为了评职称,将讲稿七拼八凑,自费出版,由此带来了非议。一些评估机构也以论文的数量多寡来计算科研成果(近来有人将有人引用过的专著也计算在内),须知,理工科的教师一般都是发表论文,发表专著的极少。这是文理工的特点不同造成的。再说,一部专著已经包含着若干篇论文了,重论文轻专著岂非咄咄怪事?简单统计一下就可以发现,专门写专著的教授非常少,他的专著数量肯定远远比不上他的论文数量。写出一部专著需要数年、数十年的时间,而写一篇论文,少则一个

月就可完工。走走门路(这已是常事),或者用别的办法,以期在核心刊物或者权威刊物上发表。对文科而言,写论文难,还是写专著难,这是不言自明的。其二,撰写 20 世纪外国作家的研究专著不是仅仅看看中文译本就可以交差的,不错,有的人撰写外国作家的论文的确不看或者很少看外文资料,这就是所谓从中文到中文的研究方法,这显然不可取。话说回来,如果外语不好,必然舍弃外文。另一方面,搜集外文资料是艰苦的、长期的工作,需要研究者想方设法,到国内的图书馆和网上去查找,到国外去购买书籍,起码得弄到几本好书,确知外国学者研究到什么程度,有哪些真知灼见,而不是闭门造车。翻开一本论述外国作家的专著,只要看看作者运用的材料、引用的资料有多少,便可略知他的功夫下得有多深,他的这本书有多大价值。说实话,评阅一篇外国文学的论文,一般都要看看撰写者参考了多少外文资料,因为这确是评价一篇论文的一个重要方面。专著对外文资料的引用无疑要多于论文,因此,专著作者所下的功夫也要多些,难度系数也增加了。其三,作家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作品的内容研究上,还需要研究他的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成就,不单是写出一部代表作的艺术特点,而是要分析这位作家的艺术观和总体艺术特色。过去的研究就缺乏这一部分,应该说,当今的作家研究也有不少缺乏这些分析。外国作家研究,广而言之,外国文学研究,应该扭转这种只重作品内容,忽略作家思想和艺术分析的弊端。一部作品取得成功,是由于这位作家站在一定的思想高度,运用了出色的艺术手法才达到的,因此,这是研究一位作家必不可少的工作。认真做出这一分析,对读者、对我国作家都有鉴赏和借镜作用。其四,一部专著,少则二十万字,多则三四十万字,不然分量不够,而印数一般是两千册至五千册,出版费用要好几万元,否则出版社不大肯做这种赔本生意,所以需要外界资助才能出版。这是造成专著少的一个原因。本丛书由国家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 世纪外国作家研究丛书”专项资金资助出版,解决了出版难的问题。

收入这套丛书的专著,我们力求分析全面,立论精当,材料丰富,有所创新,文字流畅,希望能以此促进外国文学研究。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 1

第一节 跨界生存境遇中的混杂化写作 / 4

一、移民带来的跨界生存命运 / 4

二、置身后殖民文化境遇 / 7

三、跨界生存中的混杂化写作 / 15

第二节 从边缘到中心的接受与研究 / 19

一、国外奈保尔研究综述 / 19

二、国内奈保尔研究综述 / 35

第三节 本书的主要思路 / 44

第一章 跨文化、跨文体的多重叙事——多元文化场影响下的创作取向 / 48

第一节 既内在又外在——特立尼达“拼盘”文化的混杂影响 / 49

一、混杂文化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 / 50

二、以西班牙港为起点：混杂文化影响下的创作选择 / 56

第二节 既亲近又疏离——对印度族裔文化的双重态度 / 62

一、无法割舍的故土情结 / 63

二、难以投入的“生母”怀抱 / 70

第三节 既依附又背离——英国文化养子的二难心态 / 77

一、对英国文化的依附 / 78

二、对宗主国文化的背离 / 81

第四节 杂糅型文体——混合文化身份的表达策略 / 86

一、小说中的非小说因素 / 87

二、非小说中的小说因素 / 92

小结 跨文化、跨文体的多重叙事 / 95

第二章 小说文体与移民、殖民地人边缘文化身份的表现 / 97

第一节 兼备传统与现代风格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 98

一、儿童叙述视角与成人叙述视角的复调变奏 / 98

二、边缘人文化身份——小说艺术表现的中心 / 105

三、地方色彩与现代色彩的交融 / 107

第二节 家族传记与移民“史诗”——长篇小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 110

一、无处觅家园——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史诗” / 112

二、走向边缘化——一幅幽默而悲伤的移民图 / 117

三、史诗体与现代长篇小说的有机杂糅 / 122

第三节 移民和殖民地生活的讽刺画——长篇小说《模仿者》/ 129

一、“憎恨压迫者，惧怕被压迫者”——奈保尔的双重讽刺 / 130

二、隐喻与象征构成的讽刺画 / 136

三、在虚构与纪实的交织中展现讽刺 / 141

第四节 充满讨论、思辨色彩的后殖民小说——长篇小说《河湾》/ 143

一、非洲后殖民社会模糊、混乱与分散状态的写真集 / 144

二、移民的流亡命运与后殖民地人的身份迷失 / 150

三、强烈的讨论思辨色彩 / 155

小结 虚构为主、纪实为辅的小说文体 / 159

第三章 旅行记录体与第三世界社会文化的考察与剖析 / 163

第一节 “东方学”视角与印度文化身份的寻根之旅——《幽暗国度》/ 165

一、“东方学”视野中满目疮痍的印度 / 166

二、文化寻根之旅中的忧愁与焦虑 / 174

三、夹叙夹议的互文性文本 / 176

第二节 印度文化的反思、批判之行——《印度：受伤的文明》/ 180

一、对受伤的印度文明的反思性批判 / 180

二、议论为主、记述为辅的文化旅行记 / 186

第三节 宽容而乐观的印度旅行采访记——《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189

一、描绘充满变化、叛变的印度社会“众生图” / 190

二、格调乐观的旅行采访记 / 199

第四节 “普世文明”视野中的伊斯兰世界 / 201

一、客观记录与主观判断的混杂——《在信仰者中间》/ 203

二、“作者隐退、人物出场”的人物传记——《超越信仰》/ 212

小结 纪实为主、虚构为辅的旅行记 / 230

第四章 自传体与自我和英国社会文化身份的剖析 / 232

第一节 寻找创作与生存的中心——自传性作品《寻找中心》/ 235

一、英语语言文化背景中的写作历程与家庭历史的回望 / 236

二、在写作与旅行中“寻找中心” / 243

第二节 英国文化身份的艰难“抵达”——自传体小说《抵达之谜》/ 250

一、在背离与依附的矛盾中艰难“抵达” / 252

二、文体杂糅的自传体小说 / 261

小结 纪实与虚构的有机交织 / 268

第五章 混杂化叙事与混合文化身份的艺术新探索 / 270

第一节 跨越时空与文体界线的多重嵌套叙事——《世上一条路》/ 271

一、穿越历史“碎片”与“断层”的嵌套式叙事 / 272

二、重复与重构：写作之路与历史之路 / 291

第二节 混合文化身份与混杂化叙事的有机结合——《半生》/ 298

一、“一半加另一半”的混合身份与跨界生存 / 299

二、跨时空、多视角的混杂化叙事 / 309

小结 成熟的杂糅型文体 / 313

结语 继承与超越、融合与创新 / 315

参考文献 / 323

附录一 奈保尔作品中、英文目录及分类 / 336

附录二 奈保尔年谱 / 340

后记 / 343

绪 论

20 世纪以来,移民跨界生存与跨界写作的现象越来越多,全球化思潮和信息网络技术社会的到来使这一现象更加普遍化,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移民文学的成就证明跨文化叙事与跨文体写作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① 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也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呈现出鲜明的“跨文化”色彩和“多元化”文化价值取向,^②在文

① (1) 现代主义文学各流派中有不少作家主张对传统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上进行全面的改革,提出了反小说、反戏剧、反人物、反情节等激烈的主张,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文学,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学,打破了不同题材、不同文体之间的界限,形成了混杂化创作的倾向,如意识流小说代表《尤利西斯》混杂了各类文体形式,超现实主义者的写作试验打破了传统文学表现领域和文体界线等。(2) 后现代文学在各种具有强烈解构色彩、不确定性特征的后现代理论影响下,创作上表现出大众化、消费化、技术化、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界线、文体混杂化等特点,如新小说派的写作把电影叙事、科学叙述等杂糅于文学创作,开启了小说表现的新天地,等等。(3) 全球范围的移民作家群体的出现也呈现为一种“跨界流散写作”(writings of Diaspora)倾向,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写出一部自己的移民文学史。中国、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印度、北欧东欧各国、非洲各国、东南亚地区、加勒比地区等都是主要的移民源地或宿地,涌现了大批著名的跨界作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近现代以来海外移民数量大增,各国华裔作家辈出,在欧美各国、东南亚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华裔文学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也形成了热潮,如林语堂、赵健秀、汤婷婷研究等。俄罗斯移民文学大致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涌现出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弗拉基莫夫等作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移民跨界写作也成就非凡,获得世界声誉的移民作家主要有日本的石黑一雄、乔伊·可嘉娃等,印度的拉什迪、奈保尔等,捷克的米兰·昆德拉,波兰的康拉德等,非洲有尼日利亚的钦努阿·阿契贝、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库切等。这些都为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解读与研究空间。(前两个方面详见郑克鲁:《外国文学史》(修订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三个方面参见弗·阿格诺索夫:《俄罗斯侨民文学史》,刘文飞、陈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版;姚申:《换语之人:后殖民时代的跨国创作运动》,《中国比较文学》,1997 年第 2 期;王宁:《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特征》,《中国比较文学》,2004 年第 4 期;孟昭毅:《流散写作:东方文学研究新垦拓的沃土》,《东方丛刊》,2006 年第 2 期;杨中举:《跨界流散写作:比较文学研究的“重镇”》,《东方丛刊》,2007 年第 2 期;等等。)

② 肖淑芬:《跨文化语境下的诺贝尔文学奖》,《当代外国文学》,2006 年第 3 期,第 145 页。

学表现的具体内容与艺术形式上也具有突出的混杂化倾向,从1990年得主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到2006年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大都如此:帕斯的获奖评语中说他“成功地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的文化、西班牙殖民者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①鲜明地强调了他创作中的跨文化倾向;1991年得主戈迪默的获奖评语中说她的作品“在反对种族歧视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②肯定了她所主张的种族、文化平等思想;1992年得主沃尔科特的评语中说他的诗歌“是多元文化驱动下的产物”,^③赞扬了他诗作中表现的多元文化思想;1993年得主莫里森的颁奖词中对她追求黑白两种文化与种族的平等的愿望给予了充分肯定,说“在文学作品中她也同样把白色人种与黑色人种视为不可分离片刻的伙伴,他们形影相随紧密相联”;^④2001年得主奈保尔的颁奖词中指出他的作品涉及“特立尼达这个西印度群岛”,“涵盖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亚洲的伊斯兰国家,以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英国”,^⑤横跨了多个地区和多种文化,形成了混杂化的风格;2003年得主库切因其作品“精确地刻画了众多假面具下的人性本质”和“内容的多样性”而获奖,他的主要作品表现了欧洲文明与非洲文明的冲突与融合;^⑥2006年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获奖的理由是“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杂糅的艺术新象征”,^⑦帕慕克本人也多次断言,“我相信混杂化(hybridization)是新生活的模式”。^⑧体现出鲜明的文化混合倾向。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公认的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这些获奖作家所表现的思想倾向与艺术追求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方向,对其思想倾向与创作成就作出科学的定位与评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

① 毛信德等:《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词全编》,毛信德、蒋跃、韦胜杭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863页。

② 同上,第872页。

③ 同上,第897页。

④ 同上,第930页。

⑤ 瑞典文学院:《二〇〇一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阮学勤译,《世界文学》,2002年第1期,第133页。

⑥ 杨中举:《J. M. 库切获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5期,第32页。

⑦ 杨中举:《营构文化冲突与杂糅的艺术新象征》,《译林》,2007年第1期,第59页。

⑧ Michael Skafidas, *Turkey's Divided Character*, in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 17, No. 2 (Spring 2000), p. 21.

1932~), 被誉为后殖民文学的典型代表, 具有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说的“混合文化身份”,^① 他的移民经历、文化身份构成和创作均体现出鲜明的跨文化、混杂性特点, 在上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颇有代表性。奈保尔出生于西印度群岛英属前殖民地特立尼达一个印度移民之家, 20 世纪 50 年代初又二度移民到英国牛津大学求学, 从此开始了在英国的学习、生活和写作生涯, 并加入英籍; 同时, 他又不断到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旅行考察和创作。这样, 奈保尔所具有的双重移民身份、变动不居的旅行生活和跨界创作经历, 以及特立尼达殖民地文化、印度族裔文化、欧洲文化(主要是英国文化)等多元文化背景, 共同造就了他模糊、混合的文化身份, 也造就了其创作文体风格的混杂性特点, 对此, 瑞典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授奖辞中做出了精当的评价: “维·苏·奈保尔是一个文学世界的漂流者, 只有在他自己的内心, 在他独一无二的话语里, 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家。他异乎寻常没有受到当前文学时尚和写作模式的影响, 而是将现有的流派风格改造成了自己独有的格式, 使通常概念上的小说和非小说之间的差别不再那么重要……小说式的叙事风格、自传体和记录式的风格都出现在奈保尔的作品中, 而并不能让人时时分辨出哪一种风格在唱主角。”^② 这些客观事实表明, 奈保尔是一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的印裔英籍移民作家和旅行作家, 与印度、特立尼达、英国乃至欧洲等多个文化空间相关, 文化身份与文体风格异常复杂。因而, 要比较全面地理解、研究奈保尔的创作, 应当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三种主要文体上展开:

① 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1949 年出生于印度孟买, 现任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语言讲座教授, 与奈保尔一样具有移民经历。巴巴作为当代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 与萨义德(Edward Said)和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一起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其主要著作有《文化的定位》以及他主编的文集《民族与叙事》等。巴巴关于文化、认同以及民族的理论著述在全球文学界、文化界和艺术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巴巴在代表作《文化的定位》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混合”(Cultural Hybridity, 又译“文化杂种”或“文化杂交”)观点, 他认为当今世界不同的文化无论优劣大小都呈现出一种“混杂”形态(具体参见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72.)。

奈保尔置身后殖民社会与文化语境中, 其复杂的移民经历、求学生涯和创作实践, 使得其文化身份具有混杂性、跨族性的特点。巴巴作为移民美国的知识分子, 与奈保尔有着相同的印度文化背景和移民经历, 其后殖民理论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可作为奈保尔的文化身份与文学创作研究的重要理论参考。

② 瑞典文学院:《二〇〇一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阮学勤译,《世界文学》, 2002 年第 1 期, 第 134 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第一是时间视角。奈保尔的生活、创作活动横跨 20 世纪后三分之二的时间(1932 年至今),经历了殖民主义末期、殖民地独立时期、独立后时期;移居英国后,客观上又置身于全球化进程、后现代文化发展和后殖民文学兴起的大背景中,这决定了我们首先要把他放在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境遇中进行讨论(绪论部分)。

第二是地理文化空间视角。奈保尔的移民身份和旅行生涯注定了他在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上的跨界生存状态,这要求我们把他放在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欧洲(英国为主)和祖先故土印度等多种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其复杂的文化身份与混杂文体的关系,同时也要把他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旅行经历、所见所感当作研究的重要审视角度(第一章)。

第三是创作实践视角。在这一方面要以基本同等的力度解读、研究奈保尔的小说创作与非小说创作。他至今创作的 30 多部作品中,小说文体、自传性文体、旅行记录体“三体鼎立、平分秋色”,所占的数量基本相当;更为主要的是,他的主要思想、文化、文学观点基本体现在非小说作品中;在这一维度上,不仅要指明奈保尔混合文化身份与杂糅型文体存在的事实、形成原因,而且要对混合文化身份表达与杂糅文体之间关系做考察与分析,讨论其创作文体的杂糅特征,揭示其跨文化、跨文体的多重叙事规律,具体探讨他在继承、融合多种文学传统基础上取得的超越、创新之处,以期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奈保尔。这一研究维度可以弥补目前国内奈保尔研究的薄弱环节——从下文有关国内奈保尔研究的综述中不难看出,当前国内奈保尔研究主要局限于小说作品(第二至五章)。

以上三个视角、三种文体的考察与研究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其中,以时间视角作为分析研究的大背景,以地理文化空间视角为基础,以创作实践视角为主要研究内容,形成点面结合的研究线路,以揭示其跨文化、跨文体的创作风格。

第一节 跨界生存境遇中的混杂化写作

一、移民带来的跨界生存命运

1932 年,V. S. 奈保尔出生于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查瓜纳斯镇

(Chaguanas),其祖父在19世纪80年代作为印度契约劳工移民到此从事甘蔗种植园劳务工作,^①从此这个来自印度比哈尔邦的婆罗门之家开始了它的海外生涯。按照出生属地原则,奈保尔在特立尼达生活了18年,算得上是土生土长的特立尼达人;按照种族血统原则,奈保尔的祖辈、父辈都因循严格的印度种姓婚姻传统,与同种姓级别的婆罗门家族通婚,故奈保尔又是纯正的印度人。1950年,奈保尔18岁时,获得了特立尼达政府的奖学金,赴英国伦敦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居英国生活、写作,并娶英国女子帕翠西娅·安·黑尔(Patricia Ann Hale)为妻,^②最终获得英国国籍,成为法律上认可的英国人,也成为具有双重移民经验的人;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不安居于英国的旅行者,西印度群岛、非洲、印度、东南亚、中东、南北美等地都留下了他的旅迹。这样,从印度到特立尼达、再到英国、从英国又到世界其他地方,奈保尔经历了多重地理与文化空间的跨越,汇入到全球移民的潮流中,成为一个典型的跨界生存者,受到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氛围、文化空间、宗教信仰和文学传统的冲击和塑造。对自己的这种经历和多重文化境遇,奈保尔在其自传性作品《抵达之谜》中明确指出:“因为在1950年,也就是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大规模的移民潮。我就处于移民潮的前锋,来到了伦敦。当时欧洲人基本上迁往美国定居,而这场移民潮则是一场更大范围的人员流动和更多不同文化的融合,是发生在所有国家之间的人员流动。”^③足见奈保尔对自己的移民文化处境与跨界生存境遇有着比较明确的认识。

“移民”一词在英文词语中有immigrant与emigrant两种表达,它们

① 印度人移民到加勒比海地区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1797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特立尼达之后,岛上劳工特别紧缺,1814年时任特立尼达总督的伍德福德爵士提出引进印度劳工,随后一些零散的印度人开始移民而来,1844年政府决定同意从印度迁入2500名工人。从此,大量的印度移民涌来,成为特立尼达及西印度群岛上的主要居民群体。“这样一来整个西印度群岛人口的格局便经历了一场急剧的变化,在1837年到1917年之间,印度人进入英属圭亚那的不下二十三万八千人,进入特立尼达的十四万五千人,进入牙买加的二万一千五百人……这足以说明总计已有近五十万印度人进入加勒比海地区了。”参见埃里克·威廉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民史》,吉林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组,吉林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247页。

② 帕翠西娅·安·黑尔,与奈保尔同岁,1952年2月结识奈保尔,对病中和创作焦虑中的奈保尔给予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帮助,二人1955年在伦敦结婚,打破了婆罗门种姓婚姻禁忌,形成了跨种族婚姻,而这种跨界婚姻从生物学、人类文化学等视角看则是文化混合的重要表现形态。婚后30年的生活中,她一直生活在奈保尔的怪脾气和指责的阴影里。1996年2月妻子病故,4月奈保尔就迅速同一个名叫娜迪拉(Nadira Khanum Alvi)的巴基斯坦女人结婚。详情参见美国作家保罗·索鲁《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秦於理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奈保尔:《抵达之谜》,邹海仑、蔡曙光、张杰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56页。

相近而又相别的意义清楚地表达了两种移民走向,immigrant意为外来移民,主要指移入的外国人,是从本国、本地人视角对移入者的界定;emigrant意为出国移民,指移居国外的人,是从原籍的角度对外移者的规定。但不管移入还是移出,移民主体都要遭遇空间的越界和文化的跨界,也就是说移民者要面临移民后的水土环境适应问题,种族或部族间的血缘混合问题,身份定位、文化归属、语言转换等问题。移民客观上割断了与故土、种族、家庭的联系,移入一种全新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化背景中,与当地的土著文化、人种、语言等混合杂糅,处于种族、文化、语言的多样性、多元性之中,境遇十分复杂。美国移民研究专家阿瑟·曼指出了移民的四个类型:第一种类型为全民族性者。这类移民的生活还全部停留在其民族群体的生活圈内,与本族人共同就学、工作、祈祷,在饮食、起居、婚嫁上都保留着传统的习惯,甚至在选举的时候,也只偏爱自己的同胞。第二类为半民族性者。他们有分寸、有选择地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格。第三种是游离者。这类人在本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环境中长大,但出于自己的意愿不再返回家园。第四种为混血者,也可称做多种族人,这类人不可能把自己统一于某一个血统。他们有着多重祖先,出生于长期异族通婚的家庭。^①按照这一分类标准,奈保尔家族早期移民属于第一种类型,他们在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里保持着独立的印度种族群体生活,保留着自己的信仰、饮食习惯、婚姻传统;奈保尔本人移民英国则属于第三种类型,即他是一个游离者,甘愿居留国外、谋求自己的人生之路。

不管怎样,移民后的群体或个人早晚都要面对文化认同与同化的问题,至少面对两种以上的文化冲突与影响,在移民主体身上主要呈现出三种状态:第一,有的移民感到前所未有的解脱自由,获得了认识世界的新视野,经历着更广阔的人生体验,融入移居国文化中。第二,有人则面临着自然水土和文化精神水土适应上的痛苦,体验着文化归属的焦虑,承受着迷失自我的风险,感受着孤独、迷茫、彷徨的情绪,被抛出主流社会,生存在边缘境地,这种状态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要经历一代人或几代人。为了寻求现实和精神的栖居家园,他们都会主动地调整自己,重新确认自己,而他们能依靠的背景和“材料”只能是曾经生存过的旧

^① 阿瑟·曼:《从移民到文化移植》,见卢瑟·S.利德基《美国特性探索》,龙治芳、唐建文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文化系统和移居地的新文化系统,这样他们就自然而然地栖居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系统之间,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对话场”中,在这个文化场中移民者面临着自身文化身份的消解、调整与重构。这一部分人比较常见。第三种是无法与当地文化融入,自然水土与文化“水土”均不能适应,只好采取撤退策略,退缩在自己的移民文化圈子里,或者返回故土文化生存环境,结束移民生活。

奈保尔显然属于第二种状态。移民经历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跨界生存者,身跨印度、特立尼达、英国三种地理与文化空间。天生的印度族裔文化、复杂的特立尼达殖民地文化、宗主国英国文化构成了奈保尔生存与创作的“文化场”,每种文化在不同的时期都以不同的力量时强时弱地“辐射”着他,争夺着他的认同,塑造着他的文化身份,而他自己又难以完全进入其中任何一方,也无法彻底摆脱任何一方,由此形成了他模糊、混杂的文化身份。因而,描述这种混杂身份的状态、生成原因,就成为我们研究奈保尔创作的必要前提。

二、置身后殖民文化境遇

奈保尔移民英国时期,正是“二战”后世界各殖民地人民纷纷宣布独立、走向自主发展的时期,奈保尔家族的故国印度于1947年脱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宣布独立,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则于1962年走向独立之路,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殖民主义势力虽然结束了对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管理、军事占领,但是宗主国仍然在经济、意识形态、文化思想等方面对殖民地国家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大多数前殖民地还不能及时摆脱殖民者给它们造成的物质贫困,不能有效调整不良的经济结构,甚至军事上也要寻求宗主国的保护,所以殖民地都没有完全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和依赖,从而进一步导致了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等各方面被边缘化的状态,这引起了不少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反思,有些宗主国的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现象,他们对长期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 and 质疑。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批反思历史、重写历史,对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进行抵抗的历史著作、文化理论著作和文学创作,这些作品重新思考历史和现实,重新审视殖民地文化与殖民者文化的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立学科性质的后殖民理论与文学思潮,其重大的收获就

是后殖民文化理论的兴起和后殖民文学的繁荣,理论代表人物有弗朗兹·法农、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霍尔、齐努瓦·阿切比、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等,文学方面的代表有恩古吉·瓦·提昂戈(肯尼亚作家)、齐努瓦·阿切比(尼日利亚作家、理论家)、拉什迪、奈保尔等,他们大都来自第三世界,在对自己文化身份认证时都产生出身份认同焦虑和定位困惑,因而他们理论的中心和创作的焦点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质疑、抵抗,并特别关注第三世界人民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问题。他们要求从过去那种属下的处境中走出来,对抗霸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寻找自我的栖居之所,他们生活在第一世界,所依赖的背景是第三世界,不回避殖民地的落后和贫困,正视自己从属的地位,重点思索自己为什么处于这种从属地位,质问殖民地的境况形成的内在原因,把长期以来受到忽视、歧视的“边缘”社会、“边缘”群体、“边缘”文化推到学术研究和文学表现的前沿。

奈保尔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是否属于后殖民作家之列,但是后殖民理论家、批评家一直把他当作典型的后殖民作家来对待,如后殖民理论的领军人物萨义德、巴巴、斯皮瓦克,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巴特·穆尔-吉尔伯特、齐亚乌丁·萨达尔等,非洲的弗朗兹·法农、阿卜杜尔·简穆罕默德,以及澳大利亚的海伦·蒂芬等人,都把他当作后殖民作家来分析。由此看来,奈保尔客观上又置身于后殖民文化语境中,研究奈保尔自然也不能回避这一理论背景。

后殖民理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起始于何时,终止于何时,至今没有定论,有人认为它始于20世纪初:“后殖民批评和后殖民理论同样都包容了一系列实践……任何斗胆要编写这些实践历史的人都可能至少要从20世纪初开始。”^①美国学者、后殖民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认为后殖民“始于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到达第一世界学术圈时”;^②也有人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就是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或许可以不夸大地说,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一书,单枪匹马地开创了一个学术探讨的时代:探讨后殖民

①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语境、实践、政治》,陈仲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in *Critical Inquiry*, No. 20, 1994, p. 329.